

# 剪不断理还乱的《一束乡愁》

□ 彭定海

的绰号多姿，  
乡愁是大雪过后孩童留在雪地上歪歪斜斜的脚印，  
乡愁是一坛陈年的老酒，是一串剪不断理还乱的千千结……  
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乡愁。  
安频同志有着怎样的乡愁呢？  
他把自己的“乡愁”灌注在了笔尖下，倾诉在了文章里。  
安频同志生长在农村，参加工作后多半时

安频同志第五部散文集《一束乡愁》，近日已由全国百强出版社之一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文集汇集了他近几年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的数十篇散文。  
手捧《一束乡愁》，乡村的人、童年的事顿时浮现在了我眼前——  
乡愁是什么？  
乡愁是晨露未干的田野砧砧“唧唧”的叫声，  
乡愁是暮霭时分农舍房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  
乡愁是油纸伞下女人脚穿木屐走过小巷

## 我的小学

□ 戴明

生了，就这样，我懵懵懂懂地拜师读书了。  
安频好座位后，先生交代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，站在先生旁边，看先生用红毛笔圈了《百家姓》的前几句，一张纸左右对折，每面三行，每行四字，然后一字一句带我读。先生读一句，我跟着念一句，如此反复，直到先生认可了，就让我回到座位自己反复朗读和背诵。直到流畅背诵后，离座请先生一遍，检查如果不过关，待先生指正后再回座位重背，检查过关后，先生就再继续教授新内容。记得第一次是两句，第二次是四句，全章六句可以流畅背诵无误后，先生要我往砚台里注水、磨墨，在我磨好墨后，先生来到座位指导我握笔，并手把手一笔一画地在先生红字帖上描写，这叫描红，一边描一边讲笔顺，好在父亲在家教过我握笔和写自己的名字，先生看看可以后，让我独自将字帖再描一遍，然后交先生批改，先生批改时常用红笔在有的字或笔画上画圈表示肯定。到放学时先生会再写一张红字帖，内容是当天所学内容，作为作业回家背诵。描红，第二天先生会检查，我每天学习都非常认真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学生时代，很少有回顾其小学阶段的，那个时候年纪尚小且单纯，留存心中的印象为数寥寥。我的小学一波三折，大致是八岁上学，七任老师，六年时间，五个地方，四种形式，三次休学，二次毕业。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复杂。  
六岁多可以上学时，我的弟弟出生了，父母没有提和我上学的事，我便陪着弟弟玩，直到弟弟可以自己走路，这时我八岁已过。  
20世纪60年代，国家还处于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，全乡（那时叫公社）只有一所公立小学，学校不大，只有两栋平房，有一栋还是砖墙草屋顶，能招收的学生十分有限。老师离家好几里地，而且要经过一些沟渠、水塘，那时家长没有时间天天接送学生上学放学，所以离公立小学较远的村子就采用老办法，家有学龄儿童的家长联合起来请一位老师，老师当然既不可能是接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，也不可能学富五车的大家鸿儒，只要被认为在当地有些文化的人即可。老师的待遇不高，大致是在学生家轮流派饭，每学期交多少升米作为学费。因学生人数、各地经济状况和老师的能力高低有所不同，学生的要求也不高，一部分主要是扫盲，读一两年，认识些字，可以帮家里做些事的时候就结束学业了；另一部分作为过渡，大一些再去较远的公办学校上小学；还有一部分家长就是想让孩子接受一段时间的传统私塾教育。

教室是由家里房子较大的村民无偿提供的堂屋，学生们自带桌椅板凳和教材，教材听老师的要求而定，年长的老师多是讲授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之类的教材，高年级也有学习四书五经的，年轻的老师则多使用公立小学校的教材。  
我启蒙学习是在本村当年才开设的私塾，老师是位王姓的老先生，记得父亲送我到校，要我向先生鞠躬，说声“有劳先生了”，然后打开母亲用旧布和米糊一层层裱糊成的像文件夹一样的书包，里面有一本父亲用毛笔手抄的《千字文》，一支毛笔和几张纸，一方拿在手上的砚台和半截墨，父亲谦恭地指着《千字文》封页上我的名字说，您看他学名可不可以，不行的话就有劳先生赐名了，先生回复说了声可以，父亲说声那就拜托先

先生教学算得上是因材施教，会视学习内容复杂程度来安排教学进度，也会按照学生年纪大小来安排教学方式。  
第二天朝读是复习前一天的学习内容，朝读后是习字，这期间先生开始检查每人先一天的作业。习字大约半月后由描红改为写黑色毛笔楷书字帖，名之“影本”，格式同前，用比较薄的透明纸单张或装订成本，将先生的字帖套在里面摹写，反复写，直至读、写、背、识通过，先生再上新的内容。如此类推，直至学完全部《百家姓》。

下一阶段是复习，巩固全本《百家姓》，分段熟读、背诵、摹写、识字，识字不再是按顺序，而是打乱顺序，随机点认。完成一部分，再进行下一部分，直至分段完成全部内容，最后进入整本《百家姓》的诵读、背诵、摹写、识字并达到随机认识标准。这期间先生每天开始教授四句《千字文》，当《百家姓》完整背诵，随机认识、先生认可后《百家姓》学习大致告一段落，我开始正式学习《千字文》，也有同学是《三字经》或是其他教材。

学习《千字文》的方式与学习《百家姓》类似，开始分段熟读、背诵、摹写、临帖的同时，

先生也会每天简要讲解几句，对于启蒙的一年级学生来说，理解起来有困难，好在先生只是要求大致了解，主要还是读、背、识、写。学习《千字文》的后期，开始学《朱子格言》和《三字经》。这样的学习大约只持续了两周，便听大人说先生家里有事不来了。

短暂休学后，懵懵懂懂的我被父亲送到了邻村上学，仍然是私塾，老师是母亲的族兄，教学方式与第一位先生大致相仿，但要求不严，学生年纪尚小，没有教授《四书五经》之类的书。我继续学习《三字经》，还增加了《增广贤文》。那时我们都是吃两餐，早晨到校后朝读、习字，然后回家吃饭来回约一小时，回学校上课直至下午放学。有天早饭后，一直未见老师，不记得是哪位家长来到教室叫自己的学生回家，然后大声说“都回去吧，老师没了”，当时还不知道“老师没了”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知道老师前晚上吐血去世了。

第二次短暂被动休学后，原址复课，是一位年轻的像大哥哥般的老师，自报家门才知道真的是一位大哥，是我从未谋面的族兄，我们是五代以前从族兄那儿移民过来的，所以不认识，至今不知道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联系上的，大概老一辈还有断断续续的联系吧，前几年修族谱，两边在一起修订，家族史又接续起来了。

大哥老师教学虽仍是私塾模式，但采用新式教材，记得偶尔有上级小学的领导和老师前来指导和听课。新学期我们有新的语文、算术课本，同学们都特别高兴，也特别爱惜，甚至给新书包上了封皮。家里将我的书包换成了当时很新潮的塑料提袋，我高兴了好一阵。早晨到校后同样先是朗读，不同年级在一间教室，各自大声朗读、背诵不同的课文，声音嘈杂，人声鼎沸，但似乎并未互相干扰，也挺锻炼人的专注力的。然后是毛笔字练习，大约九点钟放学回家吃饭，返校后有的上新课，有的互相检查背诵，有的做作业。全班二十多人按不同年龄和基础，分片组成复式班，老师分片教学。老师将一块小木板刻成简易黑板，在黑板上演算算术、教语文生字词时，同年级的几位同学就围着老师和黑板听课，上完课后同学归位，或读或写或背诵或做计算练习，与早晨的朗读不同，此时只能默读、默背，因为不能影响老师为其他同学讲

出了一幅幅乡村生活的水墨画和百景图，读来让人如临其境，倍感亲切。

正如长江文艺出版社编审专家在编委会上，对《一束乡愁》这本散文集的评价：这是一本了解乡情、乡风、乡名最全的散文集，它真实地记载了农村改革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，是农村人寄托心灵，是城里人排解“乡愁”的好书，值得细细品读。

（作者系监利市新沟镇人，曾任监利市委办公室副主任、监利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。）

课和其他正在做算术习题的同学。

大哥老师在我学习四年级课程时应征入伍，我们这间所谓新式复式班私塾只得关停。大哥老师在部队提干，一直写信鼓励我学习，直到现在我们仍保持着联系。

第三次休学后，先后请二位老师代课，勉强完成了那一年学，学了些什么，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了。

新学年，我进入公立小学读五年级，比起私塾，公立小学多了音乐课和体育课。音乐和体育至今都是我的弱项，大约一半是天赋，一半是从小缺乏基本训练和兴趣培养吧。

我小学毕业后，初中只能到区中学，走读太远不可能，住读没有条件，而且全区一两个班，招生名额有限，有的同学就止步于刚办的小学毕业了。不知是父母知道公社在筹办初中，还是不想放弃，他们又将我送进刚开办的队办民办小学，学校在一间大礼堂里，学生被分成组，一组一个年级，这里就是一个大号的新型复式班，不同的是有多位老师，基本一人负责一个年级。感觉在这里，我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，无非是将已经背过的课文再背一遍，已做过的算术题再做一遍。不过在这里，我写作水平倒是进步不少，记得有一次是写了一篇作文，被老师批改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，后面还加了一句“盼百尺竿头，更上一层楼”，我似懂非懂，放学后问父亲，父亲说那是老师在表扬鼓励你，从此以后，我对写作更上心了。

我八岁启蒙，经历了旧式私塾、新式私塾、公立和民办小学四种形式，七任老师，五个地方，三次短暂休学和断断续续六年时间，小学两次毕业。

我终于进入了初中，成了公社初中第一届学生。不得说，由多地调入老师组成的师资力量真的很厉害，几年后学校升级成了高中，之前调来的老师都成了高中骨干老师，为推动农村普及教育辛勤工作着。

细致梳理、娓娓道来，以记录下特殊时期独特的小学教育经历，为一纪念，二为感谢。感谢时代的宽容，让我完成了小学教育，感谢国家的教育普及政策，让我得以完成后续的教育，也感谢父辈们在困难时期为后代所做的坚持与努力。感谢耐心读完这篇文章的人与我一起纪念那一段时光。

## 夏日炎炎话“玩水”

□ 曾繁华

水声一阵接一阵，好不热闹。老师不声不响地走到塘边的“跳码头”，从树上收下汗衫、短裤，返回学校。塘水中的孩子们见势不妙，只好上坡。一个个抹抹脸上的水，甩甩胳膊，踢踢腿，光不溜秋地赶到学堂，等候着一场训斥。“孩子们，你们私自下塘玩水，这很危险，是不允许的。今后绝对不能这样做！”老师好言相劝。

上午上课不能偷着“打泡澡”，孩子们改变了方式，放学后的傍晚或是周末休息时，池塘里又热闹起来。会“打泡澡”的一下水就打得扑扑地响，向塘中央游去；小一点不会玩水的孩子就抓着塘边的跳板浮着身子打起来；稍大一点的孩子从家里拖来小木板，端来木脚盆，用自己喜欢的姿势“打泡澡”（那时乡村无救生圈）；有的母亲守在一旁看着，给孩子腰间系一根绳子，好掌控下塘玩水的孩子；

有的家长也说说要让孩子注意，玩的时间久了，也就不在乎了；也有的家里管得不严，放“敞滩”，说孩子不能关在屋里长大。水乡种田，哪有不下水的，不能让孩子“砸秤砣”。那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方式里长大，他们大多数都会“打泡澡”，就是掉在水里至少能够保住自己。

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人们在挖塘泥，给“秧脚田”上肥底的同时，也给池塘洗了澡。池塘四周绿树环绕，路边野花清香，好一幅别致的画面。有人说，这口塘与大河相连，经常管涌，不断涌出清水。是啊，池塘连小沟，小沟连小河。沟塘水路活，活水自然甜。绿水长流，池塘长青。老辈子开挖池塘靠嘴“好一塘天然的‘自来水’，好一个天然的‘游泳场’！”

而如今，池塘水面浅了，淤泥深了，小沟

阻塞了，水路不通了，塘水浑浊发臭，人们不敢下塘，更不用说“打泡澡”了。

我们在教育孩子如何防溺水、懂得自我防范的同时，也该领着孩子走出家门去亲近一下大自然，让孩子学一学“打泡澡”。而今，学校部门、广播报纸、网络平台无一不在宣传防溺水的重要，防溺水的教育可谓重中之重。我们既要“堵隐患”，又要“重疏导”。让孩子们既懂安全防范，又会游泳自救，防管兼备。

现在，乡村振兴在望，各地已建立“河湖长制”，主干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治理，河水清悠，河坡干净。如果再做一番检测，没有血吸虫，在大家的监护下，带孩子去学“打泡澡”，那真是难得的童年回忆。

天蓝，水碧，地美的乡村，多么令人神往，那真是小朋友们向往的广阔天地。

## 范蠡功成隐华容

名改姓，自称“耶夷子皮”。范蠡早年曾研习理财之道。这次再操经商之业，自然驾轻就熟。他每日买贱卖贵，与时逐利，没过多久，就积聚资财巨万，成了富翁。范蠡的经商聚财之道，一是掌握好供求关系；二是掌握好物价贵贱的幅度；三是加快资金的周转率，所以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。齐国人觉得“耶夷子皮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推举他做了相国。不久，范蠡辞去官职，并将自己的万贯家财都分送给穷人，从齐国悄悄地消失了。后来，范蠡到了一个叫陶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开作坊，再次做起了买卖。不久，他又拥有了很大的一笔财富，人们称他为“陶朱公”（即富裕之人）。

《监利县地名志》记载：“范蠡离开齐国，回到楚国，定居华容。临死的时候，他嘱咐把自己的遗体埋在华容城南夷水之滨。”

《监利县地名志》的这个说法，其依据就是本篇开头所引王隐的《晋书地记》和盛弘之的《荆州记》等的记载。不过，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明确列举了众说范蠡之墓在华容西南之后，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，他这样说：“郭仲

产言在县东十里，检其碑云云：故西戎令范君之墓。碑文残缺，不详其人，称蠡是其先也。碑是永嘉二年(308年)立。观其所述，最为究竟，以(似)亲临其地，故违众说，从而正之。”

郦道元的这个说法显然有矛盾。按此种说法，在华容埋葬的就不是范蠡，而是西戎令范君，因为范蠡没有做过西戎令。《晋书地理志》明确说“陶朱家在华容县，树碑云是越之范蠡”，而早于郦道元，又曾在荆州为官的郭仲产、盛弘之、刘澄之也都认为范蠡之墓在华容，他们的说法应该更可信。因此，范蠡之墓在华容应该说是确切无疑的，用西戎令范君之墓来推翻范蠡之墓是说不过去的。可否理解为《晋书地理志》所记的华容县西南之碑是范蠡之墓碑，而华容县东十里之碑是西戎令范君之墓碑。西戎令范君可能是范蠡的后代，范蠡隐容城后，他的后人在容城生息、繁衍、为官，去世后葬在容城也应属正常现象。

清末民初湖北宜都人杨守敬，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。他在《水经注疏》中说：“《晋·地理志》无西戎县，《职官志》，武帝

置西戎校尉于长安，此令或校尉之讹。”也就是说，“西戎令范君之墓”可能就是“西戎都尉范君之墓”文字记载的错误。杨守敬也认为“永嘉在大康之后，《太康地记》言是范蠡，则非范蠡之‘西戎碑’。郦氏未见‘蠡碑’，但据郭述‘西戎碑’，故有是辨，然实未审。”

郦道元之后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，在他的典志体通史《通典》中也记载了“范蠡隐容城”的事：“监利，汉华容县。干溪水涌出。春秋时，楚章华台在城内。陶朱公家在华容县西，碑见在。又有荆台是也。”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经济学家，其代表作《通典》一书体制宏大，思想深刻，总结过去，反映现实，资料丰富，考证深入，分析透彻，开辟了编纂典章制度通史的新途径，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行政理论、政治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。《通典》说“陶朱公家在华容县西，碑见在”，应该说是可靠的。范蠡一生三次徙徙，皆有英名。他功成身退，归隐华容，也符合他的性格、品德和一贯行为。（节选自《监利历史》）

## 布衣书记

□ 陈安雄

监利市三官乡有一套出生于本乡本土、且在本地为官的县委书记，此人名叫易大振。

易大振，从小在家务农，犁耙造滚样样通晓，栽秧割谷桩桩在行。因为家里耕地太少，收下的粮食难以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以捕鱼为生。捕鱼的各种渔具，如撒网、罾网、纱网、麻罩，他都会操作。每次出门捕鱼，他都是满载而归。到了人学年龄，父母省吃俭用，供他上学念书，断断续续读了两年私塾，几次中途辍学，望校而叹。后来，经过朋友介绍，他来到三官街上一家陈姓的杂货铺当学徒，拜老板陈怀书为师，学习经营之道，帮忙打下手。他每天鸡鸣即起，掌灯做事，洒扫庭除，擦洗桌凳，摆放好各种杂货，并标明价格。然后打开大门，开张营业，吆喝声声，招揽生意。他对来往顾客热情相迎，以礼相待。顾客咨询和挑剔商品，他能够做到百问不烦，百选不厌，遵守诚信为本，顾客至上的职业道德。销售商品，他报价从无差错，应答如流水，称秤一次准，算账一口清，能让顾客们高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日复一日，他围着三尺柜台转，日行百理不出门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一心一意工作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了晚上，他盘点货物，核对账目，练习珠算，背诵口诀，写毛笔字，读圣贤书，孤灯冷月相伴，严寒酷暑无妨，熬过黑夜，直到拂晓。

学徒三年，如期出师。本打算净身出户，另起炉灶，做点小本生意。然而，陈老板看准易大振是一个人才，而且品行又好，一再劝说，将他挽留当二掌柜，全权负责经营管理陈记杂货铺，表示让他放心放手去干。易大振盛情难却，接下二掌柜的担子，和伙计们一起将陈记杂货铺经营得风生水起，有声有色，创造了良好经济收益，得到了陈老板的肯定和赞扬。到了年终，陈老板不仅给予应有的工钱，还给易大振和伙计们每人发了一套过年的新衣服。

正当陈记杂货铺处于生意兴旺，更上一层楼之时，人民政府招收人员参加文职工作，经三官街道负责人推荐，易大振毅然决然报了名，陈老板忍痛割爱，为他打行李装，为他送别。在工作中，易大振积极肯干，立场坚定，做出了成绩，成为先进工作者，被当时监利县副县长赵振声看中，成了通信员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。易大振脑子灵活，行动利索，一心一意干好工作，深得赵振声副县长信任，选拔他到新沟镇当文书，负责镇政府日常工作。1954年，监利遭受特大洪水，全县境内一片汪洋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中，易大振作为救灾的工作人员，深入灾区，为灾民发放救济粮款。每天乘着小木舟，摇船驾浆，漂泊在茫茫洪水中，穿行在风口浪尖上，把粮款送到灾民手里，也把党的温暖送进灾民心中。

洪水退却，救灾工作结束，易大振调到毛市镇任镇委（区委书记）。在毛市工作期间，结识了区干部颜家富。当时，颜家富在分益乡直河村工作，住在村支书杨永义家里，正好易大振也在该村工作。两村同住一个家，同吃一锅饭，团结友爱，无话不谈。他俩宣传政府政策，共同发动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。在短期内，互助组如雨后春笋般从直河村发展到分益全乡，进而普及到毛市全市15个乡，大大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。当年，正值严寒冰冻灾害，市委最大的湖泊沙湖全部结冰，河水断流，渡船断渡，人迹罕至，无法通行。为了给沙湖南边姚铺乡的群众送去棉衣棉被，易大振和颜家富冒险踏上冰湖，步行十几里去到达彼岸，解决人民群众御寒的燃眉之急。颜家富想起来还有些后怕，如果湖中冰块破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颜家富和易大振同心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生死相依，患难与共，成为过命朋友，亲密兄弟。颜家富对易大振很了解，深有感慨地说道，易大振做事脚踏实地，人品好、思想好，有亲和力、感召力，能文能武，志存高远，德行天下，在他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，不愧为我的良师益友。后来，两人勤政为民，努力工作，易大振进一步一个脚印，从区委书记到县委副书记再到县委书记，再到荆州团地委书记和监利县委书记。颜家富从区、镇委书记到法院院长、公安局局长和县人大常委主任。两人脚踏实地、共同进步，践行着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。

1973年，县委组织工作队进驻毛市区市公社，我作为工作队员在团市公社陈超大队驻守。县委安排易大振来到团市公社，作为工作队一员住在陈超大队11生产队。11生产队位于沙湖之滨，是一个水涡子，易大振每天和社员群众一起下湖蹚水割谷，浑身湿透，从不叫苦。

1977年，易大振调到黄冈地区红安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、县委常委。刚一到职，他就深入农村基层调研，不久便带领农业技术干部远赴海南岛从事杂交稻良种繁育，他整天顶着炎炎烈日，泡在滚烫的水田里，辛勤劳动，挥洒汗水，一干就是一个季度，为发展农业提高水稻产量作出了贡献。

刚开始，红安的干部群众对新来的县委书记易大振不太信任，但是，当大家看到易大振身着布衣、脚穿布鞋、头戴斗笠时，大家改变了看法。易大振和农民群众近距离接触，打成一片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纯粹一个地地道道农民，没有一点官架子。红安县人民群众将易大振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一致认为，易大振是一位人民的好干部，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，值得信任和爱戴。

易大振在红安县工作两年后，1979年，他由红安县迁调到罗田县任县委副书记，主管全县农业生产。罗田县位于大别山南麓，也是革命老区。战争年代，有十多万人民参军参战，其中3万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。在革命老区工作，易大振深感责任重大。罗田县总面积为319万亩，其中耕地4.98万亩，是一个农业大县。由此可见，发展农业生产成为罗田县的重中之重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易大振骑着单车奔忙在罗田2200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，跑遍山山水水，村村寨寨，将党的惠民政策和农业科学知识送到千家万户。从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到田间科学管理，从办样板、树典型到面上出成果，从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到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体系，从组织机关干部下乡支农到劳动模范来县里讲授知识。易大振在罗田工作8年，提高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，大大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。

2009年，易大振因病医治无效，不幸与世长辞，享年79岁。在他的追悼会上，在场群众200多人，以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优秀党员、布衣书记易大振，共同为他送上最后一程，也为他革命的一生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